

# 蘇聯與越南的關係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一、前言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曾在他的著作改造對我國與世界的新思維中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方面，大多是以蘇聯為榜樣；但蘇聯也犯了不少錯誤，常常不考慮個別國家的特點，而硬把自己的經驗全盤移植過去。另一方面，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已出現固步自封的傾向，即使已發覺到讓自己不安的東西，仍保持沉默，甚至刻意去壓抑掩蓋。因此，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但出現了嚴重的政經危機，而且在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之間造成了嚴重的不協調現象。<sup>①</sup>

戈氏的這段看法，用來描述越南這一、二十年間的狀況，和蘇、越之間的關係，可算是非常貼切的。本文試分三個時期，就蘇、越之間關係的進行與發展作一觀察與述評。

## 二、第一個時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以前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當蘇聯與中共之間因意識形態分歧，而呈對峙態勢時，越南勞動黨(Lao Dong Party)領導人胡志明(Ho Chi Minh)，乃決定堅持馬列主義的純潔性，並採取「六分親蘇、四分親中共」的策略，其目的：(一)遠交近攻，以蘇聯制衡中共的勢力；(二)藉加強與蘇聯的友好關係，獲取所需的武器，以實行全面南進政策。一九六四年後，新任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重新制訂了對中南半島地區的戰略目標：(一)加強對美國的「和解」；(二)完成包圍中共的形勢；(三)填補美軍撤出後留下的真空與排除中共勢力的趁機介入。<sup>②</sup>於是，蘇共決定積極提供經

註① Mikhail S.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pp. 162-163.  
註②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四年元月五日，頁五。

濟援助與軍事裝備，協助北越的南進行動。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中南半島的情勢頗為複雜。美國、蘇聯、中共、南越、北越五方，都設法在「巴黎和會」上取得最大利益。一九七一年，當美國向中共招手時，蘇聯決心增強其對北越的影響力，主要目的是：(一)要處於比美國更有利的地位；(二)削弱中共的戰略力量。

由越共軍隊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入據西貢的獨立宮時，南越總統楊文明 (Doang Van Minh) 透過廣播要求其軍隊放下武器，越戰於是就此結束。十月下旬，蘇聯黨政領導人與來訪的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 (Le Duan) 及其黨政代表團簽署了「蘇越聯合公報」，兩項包括四十個計畫在內的主要經援協議，及另外六項軍事、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議定書。蘇聯保證協助越南的經建計畫，同時也答應，讓越南加入「經互會」。<sup>③</sup>翌年二月，在蘇共召開「廿五大」上，黎筍對蘇聯的支援表示感謝與肯定。七月二日，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南北方完全統一後宣告成立。在越戰、「南進」與統一的階段裏，蘇聯因對北越貢獻極多，雙方關係日趨密切。

首先，在一九七五至七七年間，因為中共與越南華僑支持赤棉 (Khmer Rouge)，而使得越南與中共的關係轉為緊張。其次，美國國務院曾在一九七七年元月下旬，卡特就職總統後表示，希望美越關係正常化；若越南能協助尋找失踪美軍，美國就同意在越南進入聯合國一事上不使用否決權，及撤銷對越南的貿易禁運等。不料，美國參議院在當年六月宣布，前總統尼克森寫給范文同 (Pham Van Dong) 的信不具效力，使越南所要求的四十億美元的戰爭賠償頓成泡影。<sup>④</sup>

儘管卡特政府仍與越南保持對話，並透過了國際銀行組織貸款予越南，越南仍在六月廿九日加入了「經互會」，成為該組織的第三個非東歐國家的會員國。同時，越南加入了「經互會」之下的國際經濟合作銀行 (IBEC) 與國際投資銀行 (IIB)。對蘇聯而言，越南加入「經互會」也等於是強化了蘇聯的勢力範圍；並在中共的南面多了一個親密的盟友。<sup>⑤</sup>

越南加入「經互會」後，仍續與美國糾纏。到了九月下旬，越南外長阮基石 (Nguyen Co Thach) 向美國主管遠東與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赫爾布魯克 (Richard C. Holbrooke) 表示，越南可以放棄索求戰爭賠償。就在此時，中共與赤棉在越棉交界處對越南發動了反擊，並深入越境七公里。數萬名越軍配合著陸空重型武器大舉反攻。<sup>⑥</sup>同時，越南黨政領導人

註③ Carlyle A. Thayer, "North Vietnam in 1975: National Liberation, Reunifica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sian Survey*, Vol. XVI, No. 1, Jan. 1976, p. 21.

註④ 陳鴻瑜，「赤色越南的對外關係」，問題與研究，第廿一卷，第九期，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頁六一—六二。

註⑤ 中央日報（海外版），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頁三。

註⑥ David W. P. Elliot e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p. 33-34.

急忙赴蘇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結果，美國以越南入侵柬埔寨、製造難民問題與蘇越簽訂條約為藉口，擱置了美越關係正常化。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聯與越南除簽訂包括十年經濟援助、軍事援助、科學文化交流三項議定書在內的六項協議外，雙方的黨、政、軍高階層領導人在經過了延長會議討價還價後，簽署了一項為期長達廿五年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河內表明，越南受到中共的威脅，因此有必要簽訂這個友好合作條約。蘇聯的看法是，該條約確保了兩國外交的基本方向：為和平、公正、平等的國際關係而鬭爭；及兩黨的一致行動，以團結社會主義者，並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制度。雙方亦同意，以「和平共存」的原則來結合不結盟國家與亞、非、拉美三洲的人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sup>⑦</sup>

### 三、第二個時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

按照「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蘇聯應對越南提供軍事援助與維護其安全，但蘇聯無意支持越南在高棉的軍事行動。條約第六條規定，「若有一方遭受第三國攻擊或攻擊的威脅時，則雙方將共同消除該威脅」，<sup>⑧</sup>但並未強調與要求「相互的」支援，以維護該地區的安全。因此，這個條約比起蘇聯與其他國家簽訂的類似條約，顯得模糊不清。

當年聖誕節，越南竟挾持蘇聯援助而揮軍入侵高棉，於是結束了她與中共的友好關係，中共也立即停止援越計畫，並撤走了顧問與技術人員。一九七九年元月，越軍廿萬人進入高棉，親中共的波布（Pol Pot）政權被推翻。越軍把三萬名波布殘餘軍隊趕入泰柬山區，但不敢深入並傾全力消滅，唯恐引起泰國軍隊的反擊。越南不但在柬埔寨另立橫山林（Heng Samrin）政權，而且還在泰國邊境部署重兵。越南強悍作爲，令東協、緬甸震駭不安，連蘇聯亦感覺不妙。越南一鼓作氣侵棉併寮，旨在實現胡志明在卅年前創立「印支共黨」時所懷有的建立一個「印支聯邦」的夢想。於是，蘇聯小心防範越南的擴張，一面加緊控制對越南的援助，一面另作部署，對金邊與萬象（即永珍）開始採取直接領導、控制與支援。

中共在鄧小平訪美返北平後不久，決定給予河內「必要的教訓」。於二月十七日，採取行動。中共「副總理」王震向外界保證，這次教訓是有限度的行動。<sup>⑨</sup>因此，東協各國亦加入中共「反擊越南小霸」的行動，並在經貿上聯合制裁越南，泰

註⑦ Douglas Pike, "The USSR and Vietnam: Into the Swamp", *Asian Survey*, Dec. 1979, Vol. XIX, No. 12, p. 1162.

註⑧ Douglas Pike, *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Anatomy of an Alli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1987), pp. 185-186.

註⑨ Hemen Ray, *China's Vietnam War*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 106.

國方面則更允許中共借道支援柬埔寨。

蘇聯並不因為與越南簽有友好合作條約，而採取協助越南的軍事行動，反而採取了相當謹慎的態度。蘇聯外長葛羅米柯 (Andrei A. Gromyko) 首先宣布，希望中共不要破壞了布里茲涅夫與卡特高峰會議的舉行與限武談判第二階段條約的締結；接著，也適度的警告中共，須先自越北撤軍，以消除對越南的「威脅」。因此，中共於三月五日收兵時，宣稱已達成「教訓」的目的。<sup>⑩</sup>不過，蘇聯的態度已讓越南大感失望。

另一方面，正當越南與中共處於戰爭之際，蘇聯海軍的飛彈驅逐艦曾在越南海域巡弋，採取防範措施。起初，越南不准蘇艦進入越南港口；後來，因唯恐戰爭拖久不利於己，遂不得不讓蘇艦靠泊峴港 (Da Nang)，為之撐腰助威。結果，蘇聯不但使用了原先美軍留下的峴港、歸仁 (Qui Nhon)、芽莊 (Nha Trang) 等基地，並駐進「金蘭灣 (Cam Ranh Bay)」。蘇聯更利用該基地以「觀察」河內的動態。不久，中共提議，要在四月與蘇聯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且從十月起展開副外長級的接觸，進行雙方關係正常化談判；後因蘇軍入侵阿富汗而「中止」。至此河內體會到，在大國夾縫中進退並非易事。

一九八〇年七月，蘇聯消息報報導，越南外長阮基石於六月訪問莫斯科時，曾與蘇聯簽署「一九八一—八五年經濟計畫協調議定書」。根據該協議，蘇聯將協助越南建設三座地熱與水力發電廠及四十項工業發展計畫，越南則允諾增加對蘇聯出口農產品與紡織品。<sup>⑪</sup>七月中旬，蘇越雙方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蘇聯以各項援助及越蘇石油聯合 (Vietsovpetro Association) 共同探勘與開採越南南方外海大陸棚石油與天然氣協議作為條件，交換在胡志明市設立領事館與使用峴港、金蘭灣設施。<sup>⑫</sup>一九八一年春，蘇共召開「廿六大」，黎筭率團出席；會中，他強調支持蘇聯對外政策綱領及雙方進行全面合作。當年下半年，越南發生糧食、燃料與消費品嚴重短缺，在黎筭和素友 (To Huu) 緊急要求下，蘇聯供應了越南最後一季的需要。<sup>⑬</sup>

一九八二年三月下旬，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戈巴契夫率領了一個龐大的黨政代表團到河內，出席越共的「五大」。儘管越共領導人宣稱，要繼續大力開展對蘇聯與「經互會」成員國間多方面的關係，但戈氏在發表演說時表示，蘇聯不同意越南浪費其金錢的方式。他並明白指出，河內當局應集中精神去改進經濟，唯有以更理性的方式把錢用在具有生產潛力的產品上時，才能獲得蘇聯的繼續援助。當時，戈氏亦未對越南許下援助她第三個五年計畫的承諾。在另一次的演說中，他建議越南

註⑩ *Idid.*, p. 104.

註⑪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28, No. 7, July 16, 1982, p. 31594.

註⑫ O. Petrov, "USSR-Vietnam: Fraternal Cooperation", *Far Eastern Affairs*, No. 2, 1986, pp. 128-135.

註⑬ 同註⑩。

學習蘇聯改進生產效率。他同時聲稱，蘇聯的援助是有限度的，越南最好是有效運用它們。范文同當時立即保證，將盡力妥善運用。戈氏結束訪越之行前在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並未提到「看法一致」，而是僅以「交換意見」淡化了蘇聯的不滿。<sup>⑭</sup>

根據雙方所簽訂的盟約，蘇聯有義務給予越南經濟的援助與政治上的支持。八十年代初期，蘇聯每年提供越南十一億美元的援助，且大多是以長期低利貸款方式來進行。莫斯科期望越南能善加利用儘早自立。可是越南並未把援助完全用於生產投資方面，而將部份用於填補社會消費及各種補貼方面的損失。截至一九八一年底的統計，在越南卅五億美元的外債中，有一半以上的債額是屬蘇聯與「經互會」各國的。<sup>⑮</sup>越南在無力償還的情況下，便以勞力輸出來作抵償部份貸款的方式。但是不久，西方媒體便報導了有關派往西伯利亞的越南勞工受到差別待遇的消息。當時，蘇越雙方均予否認。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G. A. Aliev)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底率團訪問越南時，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美國與中共製造地區的不安定之外，越南首次以言論支持蘇聯所提關於中蘇共改善關係的原則；蘇聯則保證幫助越南的第四個五年計畫。另外，儘管越南在當時已有一萬六千名勞工在蘇聯工作，但仍答應這項輸出至公元二千年為止。<sup>⑯</sup>翌年六月，「經互會」各成員國在莫斯科舉行經濟高峰會議，越南首次參加，由黎筭與范文同率團出席；八月間，越南即獲得了該組織的經濟援助。<sup>⑰</sup>

#### 四、第三個時期：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九〇年四月

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因病去世，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Truong Chinh)率團參加其喪禮，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向越南代表團僅表示，社會主義兄弟般友誼與完全一致的觀點，並未提到中共。另一方面，戈氏却兩度接見中共「副總理」李鵬，並重申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意願。<sup>⑱</sup>所以長征等人對此關係的新變化充滿了複

註⑭ Hoang Huu Quynh, "Gorbachev and the Vietnamese Stake Deflating an Inflated Value", *Vietnam Commentary*, No. 13, Jan.-Feb. 1990, pp. 9-10.

註⑮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XXX, No. 2, 1984, p. 32675.

註⑯ Nayan Chanda, "Vietnam in 1983: Keeping Ideology Alive", *Asian Survey*, Vol. XXIV, No. 1, Jan. 1984, pp. 33-36.

註⑰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XXX, No. 10, 1984, p. 33154.

註⑱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雜的情緒。在戈氏的影響下，越南外長阮基石先向蒙古外長杜格蘇倫（M. Dugercuren）表達了願與中共改善關係之意，<sup>⑩</sup>接著，黎筭在四月下旬時又再強調，願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六月下旬，蘇聯向來訪的黎筭暗示，中南半島地區國家所進行的和平的雙邊會談，是使局勢趨向健康化的唯一明智的道路。<sup>⑪</sup>當戈氏在參加越南代表團所設之午宴時，再次聲明，蘇聯、越南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將有助於加強亞洲與亞洲以外地區和平的基礎。<sup>⑫</sup>最後，雙方簽署了包括凍結核武、太平洋安全、全亞會議、東南亞局勢健康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與擴大雙方經濟合作等多方面內容的「聯合宣言」。蘇聯答應增加對越南經援。<sup>⑬</sup>黎筭一行在結束訪蘇後，把以對話、睦鄰、互利為特色的「新思維」帶回了越南。

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蘇共召開「廿七大」，戈巴契夫在其「政治報告」的第四部份中，首先提到，社會主義無條件地拒絕以戰爭作為解決政治和經濟矛盾，與意識形態爭論的手段。蘇聯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無核子武器、無暴力的世界，一個人人均可自由選擇其發展之路與生活方式的世界。其次，戈氏認定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之中，許多矛盾糾結之處，須以協調與政治手段予以解決，以避開軍事衝突。至於蘇聯與中共關係，則寄望於未來的廣泛合作，促進雙方共同的利益，並逐步解決彼此間與國際間的問題。此外，戈氏也指出了共產黨人因應新的環境、問題、工作、挑戰等的途徑。他並提出了國際安全體系的基本原則，以作為各國領袖直接對話的基礎與架構。戈氏並未指出越南的問題是什麼，但却提出「新思維」作為越南的參考。<sup>⑭</sup>出席「廿七大」的越南代表黎筭，與蘇聯方面簽署了一項「五年教育發展協定」，由蘇聯協助越南訓練經濟人才。

蘇聯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三日發表了有關亞太政策的聲明，河內對此表示了熱烈的支持；可是，當戈氏於七月底發表海參崴演說時，越南僅表示將與亞太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友好關係，並以較多的篇幅談論其與中共關係改善的途徑。范文同對「塔斯社」記者表示，戈氏的倡議，忽略了柬埔寨問題。<sup>⑮</sup>十二月中旬，蘇共中央書記利加喬夫（Igor K. Ligachëv）率團出席越共「六大」，對長征在其「政治報告」中未明確說明其與中共關係，表示不滿。在記者會上，他說：越南須與中共直接而平等地對話；如果越南還關心自己的利益的話，那麼便有必要與中共保持對話。<sup>⑯</sup>由此來看，蘇聯已明顯地向越南

註⑩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五年三月廿日。

註⑪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八日。

註⑫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九日。

註⑬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五年六月卅日。

註⑭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六日，頁二一〇。

註⑮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34, No. 34, Oct. 23, 1986, p. 24.

註⑯ Robert C. Horn, "Vietnam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What Price Rapprochement", *Asian Survey*, Vol. XXVII, No. 7, July 1987, p. 744.

施壓。

越共在「六大」結束時宣布，七十一歲的阮文靈 (Nguyen Van Linh) 被選為總書記，而元老級的長征、范文同、黎德壽 (Le Duc Tho) 則決定辭去在政治局與書記處的職務，轉而擔任中央委員會的顧問。<sup>②</sup> 阮文靈上任後立即宣稱，越南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將會更加密切。

由於戈氏的外交政策不同於以往，故對越南的侵柬政策已不再有興趣支持了；也因為戈氏的外交路線講求務實，所以也要求越南提供農漁產品及接受蘇聯的原料與機器來抵償貸款。以往，越南承受中共的軍事壓力與東協的經濟制裁，蘇聯與「經互會」各成員國才不計較越南的官僚腐化、效率低落，提供她低利貸款。因此，越南才考慮增加與蘇聯等國的經貿來往。如今，越南勢必要先設法紓解她與周圍國家的緊張狀態，才能擴展對外貿易及促進經濟改革。

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蘇聯外長謝瓦納澤 (E. A. Shevardnadze) 訪問東南亞，最後一站到了越南。謝氏之旅旨在與各國和越南磋商，以政治方式解決懸宕已八年之久的柬埔寨問題。因為：其一，蘇聯有意在此問題上讓步，以換取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及消除東協諸國的疑慮；其二，若是越南儘早自柬埔寨撤軍，則可減輕越南國內的經濟壓力與蘇聯的軍費負擔；其三，蘇聯設法一一排除其外交政策上的障礙；其四，可以緩和亞太地區形勢，進而提高戈氏的政治聲望。但是，東協各國認為蘇聯對峴港和金蘭灣仍然無意放手，反而倍增其對越南的援助，使謝氏此行的成效被打折了。

阮文靈五月中旬訪蘇，雙方雖曾談過經濟援助與柬埔寨問題，但從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來看，他們在柬埔寨問題上並未取得進展。不過，越南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七十週年而出刊的共產雜誌及其「特刊」上，還對蘇聯支持越南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表示滿意與感謝。<sup>③</sup>

蘇聯在一九八八年五月間，開始自阿富汗撤軍；十一天後，越南宣布，到一九八八年底為止，將自柬埔寨撤出五萬名部隊，撤銷駐柬軍事指揮部，及把所剩部隊（約七萬名）撥交給金邊指揮。<sup>④</sup> 越南主動提出稍為具體的撤軍計畫，一方面是因來自蘇聯的壓力；另一方面却是想藉此以換得美國的經濟援助及在「解凍」後可利用西方的貸款來紓緩因經濟貧困所造成的壓力，與利用西方的設備來汰換蘇聯的陳舊裝備。但是，美國國務院官員重申，在越軍完全撤出柬埔寨及該地區問題獲得政治解決之前，美國仍堅持其「三不」政策；不提供援助、不進行貿易與不外交承認。<sup>⑤</sup>

註②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XXXIII, No. 4, Apr. 1987, p. 35068.

註③ FBIS, EA/Vietnam: Tap Chi Cong San, Special Issue and No. 10, Feb. 1 and 9, 1987.

註④ Ronald J. Cima, "Vietnam in 1988: The Brink of Renewal",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1, Jan. 1989, pp. 68-70.

註⑤ 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二日，頁一〇。

九月，戈巴契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市再次發表關於亞太政策的談話；他表示，若美國放棄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蘇聯海軍將同時停止使用金蘭灣。阮基石對此深表不滿。他認為，金蘭灣是越南的港口，不是蘇聯的基地；越南只是會答應將它作為蘇聯艦隊的補給站。以金蘭灣作為進行談判的議題應是越南的事，而不能作為蘇聯交易的籌碼。<sup>④</sup>為此，越南特召回駐外使節開會。不過，蘇聯的這項倡議所產生的意義與影響對越南與其他亞太國家來說均甚重大。

以往，一般人都認為，自從蘇聯在使用金蘭灣後的若干年裏，所投下的資金與代價，讓她不可能從那裏完全撤走，頂多也只是在擺姿態以達成談判上的政治影響而已。但是現在却有跡象顯示，蘇聯是有心要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因此：(一)她對中共與越南在南沙羣島所發生的摩擦，保持極低姿態，並未提供衛星偵測情報給越南；(二)蘇聯外長曾建議越南，在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時，也順便把金蘭灣開放為自由港或將它租給美國。<sup>⑤</sup>

另一方面，一九八八年「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十週年時，越南經濟專家推測，越美關係會在一九八九年恢復正常。儘管蘇聯在越南的外貿總值中占了百分之六十四，然而它竟成了雙方相互批評的話題。越南抱怨，蘇聯的產品價值過高，品質低劣；而蘇聯則指責，越南的計畫不全、管理不善，糟塌了援助。<sup>⑥</sup>

一九八九年初，越南對蘇聯的不滿已溢於言表。先是報刊公開批評蘇聯剝削越南勞工，繼有政府頻頻向華府示好，謀求儘早恢復友誼。其主要緣故在於：(一)越蘇雙方的意識形態分歧擴大；(二)蘇聯以重整經濟結構為由，大幅削減援越物資；(三)蘇聯與中共在五月高峰會議上「自行」商議解決柬埔寨問題方案等。這些事實使雙方關係陷於低潮。

十一月初，莫斯科電臺終於就蘇越關係明白指陳，在合作方面有不少問題與缺點急待彼此共同努力來消除。<sup>⑦</sup>十二月初，蘇聯將部署在金蘭灣之飛行戰鬥軍備拆卸運走，其主要原因則是：(一)國內的經濟壓力沉重；(二)有意減少其海軍在全球的活動；(三)支持謝瓦納澤對亞洲很快將不再留有蘇聯駐軍的說法；(四)就意義與形勢上已無支助越南軍事的必要；(五)給予美國一些暗示與壓力；(六)積極促成亞太局勢健康化。事實上，美國國防部也曾證實，蘇聯為配合裁軍承諾，早已在過去數年內逐步撤走在金蘭灣的軍隊。<sup>⑧</sup>

註④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42, No. 43, Oct. 27, 1988, p. 27.

註⑤ Thai Quang Trung, "When the Cornerstone is Crumbling: Soviet-Vietnamese Military Cooperation Reassessed", *Vietnam Commentary*, No. 13, Jan.-Feb. 1990, pp. 4-5.

註⑥ *Keat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 35, No. 5, 1989, pp. 36698-36699.

註⑦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

註⑧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47, No. 5, Feb. 1, 1990, pp. 8-9.



一九九〇年初，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就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上已轉變了態度。她不但同意政治解決，由聯合國來監督柬埔寨的選舉，同時也中止了對越南兩國的軍事援助。<sup>⑤</sup>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武志公（Vo Chi Cong）認為，蘇越兩國如此的關係，實已到了需要加以檢討的地步了。在接受真理報訪問時，他表示，雙方必須摒棄舊的合作方式以發展更有效的合作關係，以及開發兩國的潛力來促進彼此在改造、革新與社會主義上的效果。<sup>⑥</sup>二月初，越南主管對外經濟關係的官員段維青（Doan Duy Thanh）曾針對蘇聯不打算每年提供廿億美元的援助時表示，雙方有必要改變經濟關係，而使其建立在更商業化的基礎上，來改變過去以補貼為主的貿易方式及單向式的援助。<sup>⑦</sup>

## 五、結 論

從戈巴契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之後，在對外政策上，首先便是積極修正其內涵。在若干次的演說與聲明當中，他公開指責追求片面優勢的想法與行徑，並呼籲有效利用各種國際組織來解決地區衝突及強化國際法律與秩序；其次，對外政策的重點放在防止核戰爭。他擺出了「合理的足夠」防禦性的戰略，從減少核武器的數目、軍費的支出，到警告核戰爭對世人的威脅，都是根據「新政治思維」來執行。所以，蘇聯的亞太政策，便配合著上述的精神與前提，透過在海參崴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兩次演講表明了三個中心信息：（一）蘇聯要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的建設性角色；（二）依據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則廣結善緣，化敵為友；（三）以對話消除對抗及衝突。<sup>⑧</sup>

蘇聯在遠東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共方面。在以往的對抗時代，蘇聯把越南視為亞洲的重要盟邦，是因為越南的戰略地位，以及越南可充當對付中共擴張的緩衝區的角色，所以對河內的態度曾經是：（一）公開支持越南在解決柬埔寨問題時的地位，並使越南處於主導地位；（二）默認河內在中南半島越、柬、寮三國中的領導地位；（三）在經濟與軍事上，維持甚或是增加對越南的援助；（四）在追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時，對越南的關心總是謹慎處理，同時並提醒中共，蘇聯絕不會出賣盟友；（五）與越南領導人保持密切接觸。<sup>⑨</sup>如今蘇聯已放棄與中共的對抗，雙方的國家領導人互訪對話，以消除彼此的潛在威脅與增加互

註⑤ 文滙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二月一日，頁二。

註⑥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一月卅日，頁四。

註⑦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一日，頁一〇。

註⑧ V. P. Lukin, "The USSR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aper I", *Adelphi Paper*, 248, 1990, pp. 17-32.

註⑨ Stephen M. Young, "Gorbachev's Asian Policy: Balancing the New and the Old", *Asian Survey*, Vol. XXVIII, No. 3, Mar. 1988, pp. 319-320.

信的措施，來改善兩國的關係與促進亞洲與世界的安定。因此，已無必要讓越南再對自己造成窘困局面。更何況越南的表現，如：(一)急於想成爲「印支聯邦」的盟主，以便對抗中共，甚至蘇聯；(二)利用蘇聯海軍在金蘭灣的駐留在解決柬埔寨問題上，一再討價還價、虛諉拖延；(三)長期依賴蘇聯的經援，不但不能自立，反而演變到經濟崩潰邊緣；(四)其改革僅觸及經濟領域，而不敢在政治上作大幅的修改，同時更閃避多黨民主的潮流，反一味在僵化的意識形態上頑固堅持等作法，令蘇聯感到心灰意冷。不過，儘管如此，蘇聯並不因爲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關係的嚴重不協調便拂袖而去，相反地，蘇聯已決定幫助越南，先和中共、美國建立更有建設性的關係，以突破外交上的孤立；接著，又鼓勵亞太各國，尤其是東協六國接納越南，來解除她經濟上的困境。如此一來，蘇聯的形象不但獲得改善、影響力加深，對盟邦盡了道義責任，而且也使亞太局勢朝和緩目標向前邁進。

\*

\*

\*